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陈嘉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一位华侨的名字受到海外侨胞和祖国人民的永久缅怀和尊敬，这就是伟大的爱国者、成功的实业家、热忱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陈嘉庚。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数十年间，陈嘉庚把他全部的财力与精力贡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爱国爱乡事业，毕生追求正义、明辨是非，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一、少年时代

陈嘉庚 1874 年 10 月 21 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这是闽南东海之滨一个山水优美的渔村，历史上有过光荣的传统。当年，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曾在这里修筑营垒，开挖水井，留下了“延平故垒”和“国姓井”的遗址。陈嘉庚生在一个国难深重的时代。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西方列强炮火的威逼下，打开了闭锁的门户，豺狼入室，中国正被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从陈嘉庚出生上溯 30 多年，鸦片战争将与集美一水之隔的厦门强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一个繁荣的商港，渐渐变成了外国强盗贩卖鸦片、掠夺我财富、诱拐华工的巢穴。陈嘉庚出生的那一年，日本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专约》，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他十岁时，法国入侵福建，一场马尾海战，清朝南洋水师全军复没。外侮日益深重，清王朝日益腐朽，陈嘉庚就在这沉重的历史脚步中长大，目睹体验了家乡的沦落，国家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辛酸。

在西方列强和封建王朝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农村急剧破产，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海外谋生。陈嘉庚的家乡素有海外经商和垦殖的传统。鸦片战争以后，农村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有更多的人抛妻别子，漂洋过海，另寻生路。很多人在当时称作“南洋”的东南亚一带落脚生根，辛勤开辟着新生计。陈嘉庚的家庭即是一个华侨世家，曾祖辈就曾有人定居海外。他的父亲陈杞柏早年只身出洋谋生，经年累月，在新加坡经营了一家米店、一个西谷米厂，还拥有一些房地产。而陈嘉庚的少年时代却是和母亲孙氏在家乡度过的。小时候他在家里帮忙做些农活，直到九岁才进入族人办的一所“南轩私塾”念书。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新式学校，幼童们认文识字多数靠这类私塾启蒙。私塾教授的课程，不外封建传统文化，课本无非《三字经》、四书之类。不仅课程内容陈腐艰涩，塾师教课方法也是照本宣科，不加解说。学生跟着朗读，不知所云何物。特别是乡村私塾的孩子，因为时常要帮助家里劳动，学习更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时断时续。就这样，陈嘉庚随塾师学习了七年，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对古文和报刊文字仅仅一知半解，后来他能著书撰文，全靠刻苦自学而成。陈嘉庚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倒是家乡的生活，家乡的风情，自幼熏陶着他的心灵，使他的根深深扎在了故土上。工余饭后，他倾听父老们谈古论今，讲述先贤们爱国报国的故事，渐渐地孕育出一颗矢志不渝的爱国爱乡之心。他日后倾资兴学，筹款抗敌，致力新中国建设，无一不是这种拳拳赤子情愫的体现。

1890 年，陈嘉庚应父亲函召第一次出洋到新加坡，在父亲的米店学习经商。当时，新加坡与今天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马六甲同为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是殖民地首府。它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海中，地处印度洋、太平洋和

欧、美、亚、非四洲交通要冲，是东南亚贸易集散市场。早在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就有人迁徙到这里，辛勤开发这一荒岛。英国人 1819 年夺取新加坡后，又掠中国“苦力”到这里从事奴隶劳动。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人民出洋谋生人数与日俱增，新加坡是他们主要的侨居地，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用血汗浇灌出了新加坡的繁荣。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后，勤奋学习，勤谨敬业，很快适应了环境，熟知了业务，协助父亲把米店经营得十分兴旺，显露出经商才能。然而，商海就像大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急浪险。1893 年到 1903 年，陈嘉庚三次回乡，娶妻、奔母丧和守孝，当他在 1903 年 7 月回到新加坡时，父亲的产业却急剧衰落了。1904 年春，陈嘉庚父亲的顺安米店倒闭，负债 20 多万元。面对这沉重打击，陈嘉庚并没有消沉，性格倔强的他决心从头开始，重新发家，并立志替父亲还清债务。

二、成功的实业家

顺安米店停业后，陈嘉庚开始了他独立经商的历程。他选中了菠萝罐头业，新加坡地处热带，盛产菠萝，质量好、采买方便，菠萝罐头远销欧美。当时，菠萝罐头销路旺，生产周期短，采买原料可以赊账，实属有利可图。陈嘉庚瞄准了行情，集资 7000 元，购买旧机器，创设“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不久又接管了另一菠萝罐头厂——“日新”公司，赶在夏季菠萝罐头生产旺季之前投产，一炮打响，办厂三个月，获利四万元。陈嘉庚是个有心人，他在经营菠萝罐头时，十分留意市场信息，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独揽了少有人做的小批量品种菠萝罐头的生意，并且改革了各厂流行的每个生产季节停工后核算的结算方法，每天结算成本盈亏，以获取准确的经营信息。他还在生产中力求减少损失和浪费，降低成本，严把产品质量关，因此很快就在竞争激烈的同业中站稳了脚跟，替父亲偿还了债务。1911 年，他已成为一年获利四五十万元的实业家了。1913 年，他在新加坡菠萝罐头业中跃居首位，产量占新加坡全部产量的一半。

陈嘉庚初出茅庐便身手不凡。然而市场风云变幻莫测。陈嘉庚决定开辟新的领域，进行多种经营来扩充实力。他的目光又落到了橡胶上。当时，橡胶刚刚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陈嘉庚敏锐地觉察到它的发展前途。1906 年，他首次出资近 2000 元买进了 18 万粒橡胶种子，建起了自己第一座橡胶园，由此开始了他的橡胶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菠萝罐头等业因战争影响，销路转滞。陈嘉庚适时转变经营方向，先后将自己的产业重点转到航运和橡胶制造业上。他租用了四艘轮船，后来又购买了两艘轮船，一面承运英国政府等官私货主货物，一面为自己运载原料和产品，既免受战争影响，又获丰厚利润。与此同时，他开设橡胶加工厂和制造厂，生产胶布，产品大半直销美国。陈嘉庚的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918 年，他的两艘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航运事业由此告终，但是橡胶事业仍在继续发展。特别是他重点发展橡胶熟品制造厂，试制各种轮胎、胶鞋、卫生用品和日用品，并在南洋、香港、国内许多地方设店自销。他的产品新颖，推销有方，畅销各地，其“钟”牌商标驰誉世界，成为赫赫有名的“橡胶大王”。到了 1925 年，陈嘉庚的实业发展到了顶峰，共计拥有胶园一万五千英亩，橡胶加工、制造厂以及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等 30 多处，还有房地产等，资产达 1200 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传奇式的华侨大亨。

陈嘉庚实业成功，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难得机遇。大战之前，西方列强争夺经济霸权，决不相让，殖民地华侨民族资本在殖民地垄断资本的压迫下艰难生长。大战爆发，欧洲各交战国忙于交火，无暇旁顾，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经济力量削弱，华侨民族资本得以抬头和成长。陈嘉庚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而迅速崛起。他的成功，也得力于他个人的才智和魄力，他比当时的许多人更具胆识和远见，所经营的许多事业，“不是为于人初为少为之时，便是为于人不敢为或未曾为之日”。他最早引进橡胶，成为新加坡、马来亚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开创橡胶制造业，为华侨开办企业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将橡胶制品直接输出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的垄断。他还通过自己的企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企业和技术人才，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卓有成就的实业家，在华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嘉庚的经营实践，为侨居地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陈嘉庚仅仅在实业上锐意进取，获得成功，那他充其量也就是个著名的大富翁。而使他彪炳史册，并赢得后人仰慕和敬意的，却是他心系祖国，把个人发展的全部所得投入到利国利民的事业中去的高尚情操。

还在陈嘉庚的菠萝罐头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也日渐高涨。1906年，孙中山亲临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作为南洋革命党人活动的总机关。在革命先驱者的努力下，南洋华侨民族觉悟觉醒，爱国热情高涨，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广泛传播，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主张逐步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也日益严重。陈嘉庚第一次归国期间，清政府败于甲午战争，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台湾被日本霸占了去，如同福建“被割去一臂”。第三次回国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美丽的小岛鼓浪屿在他眼前变成了“万国租界”。失地丧权的屈辱使陈嘉庚感受到亡国灭族的切肤之痛。而在新加坡，华侨民族资本又受到西方垄断资本的直接压迫和欺凌。弱国无国防，内不能保护自己的国民。弱国无外交，外不能保护自己的侨民。陈嘉庚在家乡和居留地饱尝了主权被践踏的国民的屈辱和痛苦，使祖国振兴和强盛是他的强烈愿望。他在经营实业的同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他阅读报刊，了解时事，革命党人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引起了他的共鸣：腐朽的清政府不倒，中国就不可能从亡国灭族的危难中解脱。1909年，陈嘉庚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为孙中山的革命言论所折服，从此他追随革命，1910年春，加入了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以示与清政府决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地纷起响应，清政府倒台。福建是11月光复的。消息传到新加坡，福建华侨一片欢腾，当即开会商议援助福建革命政府。陈嘉庚被推举为福建保安筹款委员会会长，他不负众望，筹集巨款给福建新政府以有力的财力支持。孙中山从海外归国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职务时，财政发生困难，陈嘉庚又立即汇去五万元。从这时起，陈嘉庚就把自己同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紧紧联在一起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南洋华侨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祖国走上了强盛之路，侨胞们有一个强大靠山，从此可以抬头挺胸做人，与世界各民族平起平坐。陈嘉庚也同样心情激动，只是他更进一步把对国家进步的期盼，化作自己的实际行动，他要为祖国的强盛，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1912年，急于为国效力的陈嘉庚，又一次踏上归程，返回故园，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浩大的事业——至死不辍的兴学历程。

三、倾资兴学

陈嘉庚把为国效力的方向，放在了教育上，这同他的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幼年接受旧式教育，收获甚少，对这种教育的缺陷有切身体验。到南洋经商后，他一直利用工余读书进修，勤奋学习，并接触到一些西方进步文化。在经营实业的实践中，他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在南洋，他就积极赞助当地华侨的教育公益事业。几次回国，陈嘉庚留意家乡的教育，看到的情景，使他十分震惊，只见十多岁的孩子们成群地聚在一起游玩，许多孩子光着屁股，像小野人似的，几乎谈不上教育。陈嘉庚非常痛心，决定回国一则兴办实业，一则兴办教育，以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

陈嘉庚携带着机器、资金以及技术人员回到家乡，但是兴办实业失败。他认为教育不振兴，实业也不能发达，教育是立国之本。同时认为，自己是一名平凡的侨商，除了有点资产外，没有什么其他本领可以贡献社会，而捐助金钱，不如捐给教育，说到为公众服务，也最好是去办学。虽说不一定立刻就收到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

这时，陈嘉庚家乡的教育依然极端落后。集美一地，2000余居民，全为陈姓，分成了六、七房，各房恩怨矛盾又分为两派，屡屡发生纠纷，曾数次械斗，死伤数十人。集美没有小学，各房自办私塾，各塾只收男生一二十人，女孩不得入学。当时，距清末学制改革，成立新式学校已有十几年，但是同安县20万人口，公办县立小学只有一所，学生一百多名。可笑的是十余年来该校竟没有一班毕业生。原来，学校的大权由县长掌握，校长由县长任命，教师学生都由校长招来。如果县长换人，就另派校长，全校随之变动，师生一哄而散。十多年来，县长变更多次，学校也就忽聚忽散，因此没有一个毕业班。作为全县模范的县立小学腐败如此，其余更是可想而知。大批失学儿童，终日嬉戏，也就不足为奇。

陈嘉庚决定在家乡创办小学校。他奔走各房做工作，劝说他们停办私塾，全乡合作，兴办小学，他自愿承担办学经费，终于得到各房同意。1913年春，集美小学暂借大祠堂及附近的房祠堂开学，全体子弟入学，共135人，分五级，高小一个年级、初小四个年级，聘校长一人，教员五人。

学校办起来了，校舍还没有着落。第二步，陈嘉庚便筹划修筑校舍。校址的选择几经周折。乡人不是因为妨碍“风水”阻挠，就是反对迁移坟墓。最后，陈嘉庚买下了村西一口几十亩的大鱼池，填平建起了新校舍，迁入了集美小学。1917年又开设了女子小学，招收集美的女生。为破除陋习，鼓励女孩子入学，学校规定每月给每个女生一到二元不等的津贴，于是招收了50余名学生。

事业初创，困难很多，最难办的是师资。新式教育所需教员极端贫乏，找不出几个合格人选。同安县的师范毕业生包括简易科在内一共只有四人，被陈嘉庚聘到了两人。当时福建省福州与漳州各有一所师范学校，漳州的学校是初办，成绩不佳。而闽南的学生要进福州的师范，却又特别困难。陈嘉庚前往调查，才知该校原来腐败不堪。本来，福州师范的条件很好，学生学习食宿免费，奖励优厚，所以求学的人多得打破脑袋，学校常不公开招考，当地官僚富绅子弟早已登记占满了名额，外地学子休想挤进去。结果收进去

的富家子弟既没有服务教育事业的志向，又不是考试合格入选的人才，程度高低不齐，也不管学业进步与否，只求文凭混到手，并没有几个人打算去做月薪二三十元的教师。陈嘉庚认为，要解决小学教师缺乏的问题，只有让贫寒家庭的子弟经考试选拔后再接受有关训练，才能收效。他决意一有可能就举办师范学校，招收闽南贫寒子弟而有志献身教育者，加以训练，以挽救福建教育的颓风。

1913年，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此后两年，他的实业发展顺利，赢利颇丰。实力壮大后，他便把自己的兴学志愿付诸实施，决定创办师范和中学。1916年，他派胞弟陈敬贤回乡修筑校舍，筹办师范和中学，并致信上海江苏第二师范校长代聘校长和全体教职员。在陈敬贤主持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集美建起了大礼堂、教学楼和电灯厂、自来水塔、餐厅、温水房、浴室、大操场、贮藏室等公用设施。1918年3月，师范和中学同时开学，招收学生196人，师范三个班，中学两个班。中学生免交学宿费；师范生学宿膳费全免。学校还供给全体学生所需被席蚊帐。为防止出现福州省立师范招生中的弊端，陈嘉庚实行了新的招生办法，他函告闽南30多县的劝学所，请他们代为招选愿意从事小学教育的贫寒子弟，每大县选五、六人，小县选三、四人，入校复试，合格者录取，保证了生源的质量。后来学生质量稳定后，才取消了这种做法。在中学，还对华侨子弟规定了优待制度。各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愿意回国念中学的，只要有陈嘉庚新加坡本店的介绍，都可入学。如果到校时考试不合格，可先入补习班学习。这一规定体现了陈嘉庚对华侨教育的重视，他希望以此加强华侨和祖国的联系，增进华侨子弟的祖国观念。出于同样目的，他也积极赞助发展侨居地的华侨教育，担任过新加坡道南学校的第三届总理，先后协同侨胞开办了爱国学校、崇福女校等华侨学校。特别是1918年6月，他联络新加坡、马六甲16所华侨学校总理，筹办了东南亚华侨第一所不分地域、不分帮派的华文中学——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培养了众多华侨人才。他热心教育的兴学业绩，提高了他在新加坡华侨中的威望。

这段时间，陈嘉庚的实业发展迅速，然而国内政治经济，依然黑暗。陈嘉庚忧心忡忡，深感祖国贫穷落后，民智未开，各种专业人才奇缺，他认为要改变祖国面貌，非有大批专门人才不可。此外，在创办集美学校过程中，他总是为聘任合适、称职的校长、教员费尽周折，体会到大学的重要作用。而当时福建没有一所大学，不但专门人才稀缺，中等教师也无处可以造就，遂又萌发了创办大学的念头。他把大学比作机器中的发动机，中等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好比是它的附属品，“欲求附属品之发达，非赖有完全之发动机不可”。1919年5月，陈嘉庚第五次回国，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亲自筹办厦门大学并扩充集美学校。他把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7000英亩和货栈、店屋等房地产皮面积150万平方英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并申明：“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决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所大愿也……”

陈嘉庚回到国内，便立即着手筹办厦门大学。他亲自勘察校址，看中了郑成功演武场遗址附近的山麓，这里背山面海，北面是古刹南普陀寺，南临浩淼东海，风景秀美，地场广阔，有日后发展的余地。由于这里是官地，选好地点后，陈嘉庚向政府提出了拨地办学申请，亲自起草了筹办厦门大学的通告，道出了他倾资兴学的肺腑之言：“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

国民之教育未遍，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学识，不足以躋（jí）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艰；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奚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见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7月13日，他邀集各界人士在厦门浮屿召开特别大会，倡办厦大，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倾吐了倡办厦大的动机和打算：“窃吾人欲竟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演之淘汰，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得，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他指出，中国的大学，国立仅有北京大学，其余多为外国人所办，科目不过神学、文学、医学而已，为实业所需各科稀少，高等师范仅有5所。他呼吁各方支持厦大，并表示“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当场认捐厦大开办费100万元，当年交清；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厦门大学就在陈嘉庚的积极努力和慷慨捐助下，在闽南矗立起来，成为唯一一所华侨创办的、也是唯一一所个人独资创办的大学。

1921年，厦门大学创建伊始，先设师范（分文理两科）、商学两部，在厦门及南洋各地招收学生近百名，聘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邓萃英为校长。4月6日，尚无校舍的厦门大学暂借集美新校舍“即温楼”正式开学，这一天就成为厦门大学的校庆日。

厦大开学后，陈嘉庚又主持了厦大校舍的建设。他否认了邓萃英委托上海美国洋行的设计方案，亲自规划了厦大的蓝图，既考虑到建筑布局的雄壮合理，建筑形式的美观实用，又注重节省，当前先满足各科学学生不多的需求即可，但同时要为将来学校的发展扩建留有余地。他以自己经营实业的勤劳和精细，亲临工地指导，当场解决问题，克服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建筑工程得以顺利进行。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落成，厦大从集美迁到新址上课。这时，厦大校长改由曾留学英国的林文庆担任，厦大很快便走上正轨。

根据陈嘉庚的设想，厦大要办成一个能容纳三四万名学生的大学。这样宏伟的目标，由他一人包办，实有困难。于是在厦大开办两年后，他开始尝试向南洋富商们募捐。当时南洋富商资产在百万以上千万以上的大有人在，甚至有亿万富翁。但是陈嘉庚前后三次向几位富商劝募，都遇到了拒绝。陈嘉庚并不因此气馁，始终如一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独自勉力支撑，倾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厦大，在厦大陆续修建校舍，10年后，建成40多座，3000余间，面积5.6万平方米，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需要基本上得到满足。学校不断添置图书和仪器设备，图书从开办时的几百册增加到147000多册（包括期刊）。拥有各种标本18000多件。还有各种实验仪器、机器、药品等。设立了动物博物院、植物园、气象台、生物材料处、物理机器厂、煤气厂、制革厂等，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学校陆续增设科系，到1930年，扩展为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分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银行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学等17个系。厦大注意聘请、罗致著名学者，充实教师阵容，国学家、文学家鲁迅、陈衍、林语堂、沈兼士、孙伏园、台静农、余霁；语言学家罗常培、周辨明；哲学家朱谦之、

张颐；史学家张星煌、顾颉刚、陈万里、郑天挺、郑德坤；教育学家孙贵定、朱君毅、杜佑周、姜琦、邱椿；化学家刘树杞、丘崇彦、张资拱、刘椽；生物学家秉志、陈子英、钟心焯、钱崇澍；数学家姜立夫等都在厦大创办初期来校讲过课。陈嘉庚经营厦大兢兢业业，逐步建立起面向华侨，面向海洋，注意实用，注重研究的特色，并且高度重视办学质量。一次，集美校长应学生之请向陈嘉庚提出，让集美毕业生免试升入厦大，被他拒绝，他坚持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录取的原则，不为照顾同乡子弟降低厦大的入学资格。因此，厦门大学越办越好，到三十年代，便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在创办厦大的同时，陈嘉庚还致力于扩充集美学校，着重建立培养国家民族建设所需专业人才的专门学校。根据福建省临海，有条件发展渔业、航海业的特点，他考虑在集美设立水产航海科，早在1917年就向上海吴淞水产学校寻聘教师。结果该校表示，国内水产教师奇缺，他们学校师资同样缺员，实在无处可聘。倒是有两名高材生当年毕业，如果集美需要，可以资助他们到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任教。陈嘉庚立即照办。1920年，水产科开课。陈嘉庚从德国购买了全套机器，在厦门造了一艘渔船，供学生出海实习使用。由于这是一所新式学校，陈嘉庚担心毕业生的出路，又从法国购买了一艘先进的渔轮，来厦门捕鱼，成绩很好。但由于中国经济落后，鲜鱼销路不畅，从经营上讲，渔轮是亏本的。1925年，水产部增设航海科，培养航运人才，以图振兴航海业。1921年、1927年，集美又添办了女子师范和幼稚师范，待遇和男子师范一样。又办商科，待遇与中学一样。考虑到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但是科学不发达，水利不兴，耕作落后，收获不丰，人民生活困苦，1926年集美又建农林部，希望以科学改良农业。同年，国学专门部开学。1927年，女子师范改为女子中学，国专移并厦大文科。从这年3月起，集美各部改称为“校”，一共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女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林学校、幼稚师范学校等，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教育园地。

陈嘉庚怀抱教育救国之志，百折不回，力图培养造就各种有用之材，为国家民族的振兴昌盛出一把力。集美学校的确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尤其是给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女学生提供了受教育的难得机会，帮助许多贫苦学生完成了学业，成为有用之材。但是清王朝倒台后，中国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桎梏，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先后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不振、民不聊生，教育事业也是举步维艰。陈嘉庚从国计民生着眼设立的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用的专业，学生毕业后竟无出路。例如水产学校的学生就找不到可以效力之处，真是报国无门。尽管如此，陈嘉庚矢志不渝，不论有多少困难，他认定了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业，耗尽毕生财力心血，也决不后悔。他不像有些富豪巨子，捐助教育一点金钱，以为行善积德，更有人拿资助教育来沽名钓誉，他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把兴学当作自己唯一的心愿，虽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辞。

1926年，陈嘉庚的实业遇到了风浪。作为殖民地的民族经济，他本来就是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战争中冒出头角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列强借助强权与雄厚的经济实力，重新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殖民地的华侨经济面临着强大压力，危机接踵而来。这时，英国、荷兰、美国等国家，都因橡胶制品获利丰厚而大量投入生产，日本还佐以国家津贴廉价倾销，结果造成供过于求，胶价猛烈下跌，陈嘉庚的橡胶业在国际资本的压迫下出现

了亏损。同时，由于陈嘉庚积极参与爱国侨民的社会活动，曾在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组织过募捐和抵制日货活动，被日商和亲日奸商恨之入骨，竟雇人纵火烧毁陈嘉庚的橡胶熟品制造厂新厂，造成巨大损失。1926—1928年，逐年亏损及支出达百余万元，资产损失过半。这时，陈嘉庚仍然极力维持着集美与厦大的经费。1926年提供90余万元，1927年70余万元，1928年拿出60余万元。1929年，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社会生活一片混乱。殖民地也无法逃脱厄运。陈嘉庚的实业遭到一连串打击，一蹶不振。有人劝他放弃集美、厦大以维持营业，他坚决不干，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由于他长期向英国银行贷款，终至无力偿还。1931年8月，英国政府殖民部通过新加坡银行团要求陈嘉庚改组公司作为抵债条件，陈嘉庚被迫接受，将所有资产折价二百万元，改组成立“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银行委派代表三、四人组成董事会，陈嘉庚出任总经理。1932年，一家外国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顾”，条件是停止给集美、厦大的经费。陈嘉庚断然拒绝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公司改组后，陈嘉庚在董事会的牵制下，仍然绞尽脑汁为两校筹集经费。1933年，董事会决定把企业全部出租，陈嘉庚与几家承租者约定，将获利的部分或全部充作两校经费，此外，又变卖了厦大校业（橡胶园及陈嘉庚公司股本），并向华侨募捐和借债，竭尽全力维持两校。在陈嘉庚毁家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一些爱国侨胞伸出了援助之手，陆续捐款资助，集美与厦大得以继续生存。直到1937年，情况更加困难，陈嘉庚才致信南京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自愿将厦大捐献国家，改为国立，自己则集中力量维持集美。

陈嘉庚的实业，再也没有复兴。此时，他已受制于英国垄断资本。当初英国银行团之所以强迫陈嘉庚改组公司，就是为了排挤和控制华侨资本。1933年，市场有了转机，陈嘉庚正打算扩大生产的时候，一家英国垄断公司拿着汇丰银行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经理，要包销陈嘉庚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陈嘉庚一口拒绝，汇丰银行经理竟狂妄地说：“我英国的权利不容他国人染指！”尽管陈嘉庚坚持不让步，但董事会竟越俎代庖地签了字。陈嘉庚气愤至极，决意收盘不干。关于这件事，英国反对党曾在下议院抨击过执政党殖民部大臣缺乏远大眼光，处理不当。一开始任由陈嘉庚在殖民地大规模发展工业，把产品拿来同英国竞争，把盈利汇回中国办教育，违背殖民地利益。等到它发展到很大规模时，才采取不光彩手段，趁着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通过银行团的压力迫使陈嘉庚公司关门。这种卑鄙手段，有损大英帝国的声誉。1934年，陈嘉庚的实业正式清盘。国际资本的竞争和排挤虽然是他的企业衰落的主要原因，而他投入巨资办学，影响了资金周转和应变能力，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有人替他算过一笔帐，统计他1904—1931年间总支出为1321万元，其中捐资各学校教育费837万元，占总支出的63%，加上为办学而支付的银行利息380万元，则占到了92%，大多数投给了教育。在银行团迫使他改组股份有限公司时，陈嘉庚曾拒绝担任经理。由于公司发生怠工现象，银行团不得不请人说情，请他出山，让他开出条件，他便索要高薪。但在发薪时，他却要银行团把他的薪金汇给集美、厦大作经费。银行团非常奇怪地问，你把薪金汇给集美学校，自己如何生活呢？陈嘉庚答道，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每月只需数十元即够用了。又问将如何养家？陈嘉庚说，

我的儿女均已长成，能够照顾他们的母亲了。他为教育耗尽了钱财，自己过着俭朴简单的生活。他的住所是普通的平房，陈设朴素，家俱与普通人家一样，没有一点奢华的东西。他从不为自己乱花一分钱，平时带的现款不超过5元，也不许家人随意浪费金钱。他一生都保持了这种俭朴的本色，在实业鼎盛之时，虽然收入大笔金钱，却从不用于自己享乐。他倾资办学不为利也不图名，反对别人为他歌功颂德。厦大曾打算用他的名字为新校舍主楼命名，被他否定。他坚决主张命名不应含有私意。他出资主持修建了集美、厦大一幢幢楼房，没有一座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美的师生也曾捐款准备建亭为陈嘉庚庆祝五十大寿，陈嘉庚批评这是“沽名钓誉，夸示纪念，制造虚荣”，坚决不受。所以尽管陈嘉庚的企业衰败了，他办的学校没有标上他的姓名，但是他在中国教育史上，在爱国华侨的心中却树起了人人敬仰的丰碑。

四、杰出的华侨社会活动家

倾资兴学体现了陈嘉庚的爱国情怀，但是他爱国爱乡并不局限在兴教上面。他一贯积极服务华侨公益，热心华侨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并团结侨胞支持国内抗强敌、图生存的斗争。就在他的实业收盘后，他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以崇高的声望被推上了南洋华侨的领袖位置，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步伐，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带领南洋爱国华侨为挽救民族危难、反帝图存作出了新贡献。

早在1923年，陈嘉庚实业兴旺发达的时候，他担任了新加坡百万富翁俱乐部怡和轩的总理，进入华侨社会的领导圈，便致力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社会的各项活动。他对怡和轩这个富翁俱乐部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吃喝嫖赌风气一一扫除，团结各地各帮的华侨领袖，把怡和轩变成了华侨社会活动的发源地。陈嘉庚一向持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早年曾积极赞助过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作为中国的代表。但是，他有一个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自立图强。因此，他积极参与各种爱国活动。1928年“济南惨案”，陈嘉庚通过怡和轩，呼吁侨胞救济难民，抵制日货。1931年“九·一八”事变，陈嘉庚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抗议日本侵略。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陈嘉庚发动华侨捐款并致电声援。1935年，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又发生了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发动募捐，救济灾民。1936年，他应南京国民党政府之请，负责募捐购买飞机为蒋介石祝寿。这时，他是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领袖并希望依靠他领导抗战，抵御强敌的。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陈嘉庚领导的华侨爱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先是1937年8月，新加坡各地各帮华侨统一组织了“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由陈嘉庚担任会长。其后在1938年10月，南洋各地包括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越南）及暹罗（泰国）等地45个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代表齐集新加坡开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菲律宾侨领李清泉为副主席，设分支机构85处，各处又设分会、支会，共有千余所。参加筹赈会的有闽、粤、潮、客、琼、三江等各帮，各行业，工会、妇女会、同乡会、宗亲会、学生会、青年组织、文化组织等各团体的

华侨群众。南洋各地 800 万华侨在民族危亡之际，第一次广泛地组织起抗日救国的联合阵线，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去，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国抗战，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抗日运动，取得了辉煌成就。陈嘉庚身处这一运动的核心，以他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将这一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为祖国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南侨总会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抗日立场，毫不留情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派的卖国投降行径。1939 年，国内战局紧张，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这时，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悍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一时妥协妖氛弥漫。陈嘉庚与汪精卫是辛亥革命时的老相识，他还曾有过聘汪精卫为厦大校长的打算。但在抗战还是投降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民族大义，不能容忍汪精卫损害民族利益的言行。他先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汪精卫进行规劝，汪精卫复电诡称“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陈嘉庚又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的无耻言论，指出“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随即把五封电报公之于众。这时，正好赶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陈嘉庚以参政员身分致电大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得到热烈拥护和通过，给了汪精卫之流当头一棒。当时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的身分正担任大会主席，硬着头皮向大会宣读了陈嘉庚的提案，脸色苍白，狼狈不堪。1939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出逃安南（越南）。22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的声明，内容有三：第一是满洲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29 日，汪精卫在香港公开发表电报，赞成近卫声明之原则。陈嘉庚得讯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当他看到国民党除了开除汪的党籍什么也没做时，陈嘉庚又穷追不舍：“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接着，南侨总会又发出通告，揭露汪精卫的罪恶。陈嘉庚坚持民族气节，奋起讨汪，打击了抗日阵线内部的妥协逆流，振奋了民族精神，对抗日军民是有力的支持。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它在各地的机构派出义务募捐员，每天动员数千人，采取多种办法，动员群众捐款抗日，比如有特别捐、常月捐货物助赈捐、纪念日捐、卖花卖物捐、游艺演剧球赛捐、舟车小贩助赈捐、迎神拜香演戏捐，在公共场所设救济箱等，并且积极支持各种对筹款有帮助的各种义展、义演活动。在南侨总会的筹划和组织下，筹赈工作深入到华侨社会各界，各阶层，开展得“风起风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在领导南侨总会期间，陈嘉庚一心扑在救亡工作中，几个月难得回家一次。他坚韧不拔、以身作则，为爱国华侨树立了榜样。在 1938、1939、1940 三年中，南侨总会为抗战募集的各种款项不下 30 亿元。以 1939 年为例，当年的军费共计 18 亿元国币。华侨汇回祖国之款有 11 亿元，其中捐款大约占 10%，而南侨总会的捐款又占同期华侨捐款的 70%。按陈嘉庚的计算，以一元外汇作基金可发行四元货币的通例，华侨捐款可为国民政府增添 34 亿元的经费，对于抗战是巨大的物质支持。

南侨总会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招聘华侨机工回国服务。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国沿海口岸全部被日寇占领或封锁，外援通路基本都被切断，刚刚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品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全靠此路输入，当时更是急需把存放在缅甸的抗日物资运回国内，但又缺乏有经验的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总处主任宋子良致电陈嘉庚，请求支持。对于抗日救国，陈嘉庚自然当仁不让，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要求各地筹赈会，各爱国侨领、侨胞切实认真办理。华侨机工们出于爱国热忱，积极响应，许多人放弃了相对优越的太平生活，自带工具，回国效力。几个月的功夫，就组成了3200多人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从新加坡和榕城分两路出发，回到昆明，承担起艰险重重的滇缅路运输重任。

滇缅路穿行在高山深谷之间，途经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跨越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怒江和澜沧江，全程要行驶七、八天，沿途多是深山老林，有悬崖、峭壁、陡坡、急弯、深谷，还有野兽出没、毒虫袭人。抢修而成的滇缅路路面为土筑，坑洼不平，遇到下雨，更是泥泞难行。装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这样的深山峡谷中，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由于是战时，还时常有敌机追袭。当飞机来轰炸时，机工们只能跑到山中躲避，待敌机走后，再继续开车。遇到大风雨，就只能躲在驾驶室里等天晴。艰难险阻并不能动摇南洋机工为国献身的决心，但是国民党官员腐败贪脏，滇缅路管理混乱，国民党政府对他们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闻不问，却使他们心寒，也使他们的境遇雪上加霜。他们有时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两天，生了病也没人管，行车到达沿途城镇，还得自掏腰包住宿。这些情况传到陈嘉庚耳中，他十分震惊，当即派出代表回国考察。代表回来后，汇报南洋机工待遇恶劣情况属实。陈嘉庚因此建议：1. 给每个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各一件，工作服、卫生衣各一套，羊毛袜两双，运动鞋一双，奎宁一瓶，共九件物品，于1939年底备齐送到昆明。2. 由西南运输处在沿途城镇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陈嘉庚将此建议电告国民党中央政府，结果却如石沉大海。陈嘉庚挂念着南洋机工，在1940年又第二次派人视察滇缅公路情况，发现陈嘉庚亲自经办的慰劳机工的物品，大部分都被国民党官员们贪污占用了。1940年11月，陈嘉庚亲自视察滇缅路，对机工们受到的恶劣待遇十分气愤，他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这样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他从抗战大局出发，仍旧勉励机工努力为国服务。善始善终，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了对机工负责，他又布置了修理滇缅路狭窄陡险地段，购买新货车、柏油和保养洗车工具等事。南洋机工们也不负陈嘉庚和南洋华侨的重托，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战斗在抗日运输的生命线上，从1939年1月开始到1942年5月滇缅路国际运输线被日寇切断为止，抢运了45万多吨军火物资，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回国考察

1939年冬，抗日战争已坚持了两年，半壁河山遭日寇践踏，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由于战火阻断了华侨回乡之路，南洋侨胞更加思念祖国，关心抗战局势，又苦于对国内情况知之不详。在此情况下，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

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派华侨代表回国慰劳抗战将士和遭受痛苦的民众，了解抗战局势。1940年2月，慰劳团分批启程回国。3月下旬，陈嘉庚本人也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推动募捐助祖国抗战。

由于陈嘉庚在华侨中有巨大的号召力，他领导华侨筹赈成绩卓著，国民党政府对他回国一事十分重视。他们把陈嘉庚看作一个大财神，出动了许多党、政、军大员来欢迎接待他，企图拉拢他为国民党政府效力。为此，国民党当局拿出8万元经费，准备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来讨陈嘉庚的欢心。没想到陈嘉庚对这一套极为反感。他刚到重庆机场，就声明此行不是游历应酬，希望各界极力节省无谓宴会。到了下榻处，他听说市内有名旅馆的一、二等房间全部都留给慰劳团住宿，认为不该这样铺张。第二天，他在报上登出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愿实践新生活节约条件，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他托人借了两个空房，安顿代表团居住。

陈嘉庚在重庆开始了考察。他出席了各种欢迎会，参观了街市、机关、工厂，看到大后方灯红酒绿，一派腐朽颓风。“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弟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陈嘉庚尤其对国民党要员的贪污营私深感不满。他赴宴曾经去过的嘉陵宾馆，修建得富丽堂皇，要不是孔祥熙亲口承认，陈嘉庚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所开。他不解“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从孔祥熙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财，联想到国民党高官贪污腐化当不是谣传。一次，他应邀在全国经济学年会上演讲，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发言，激动不已，痛斥国民党贪官：“现在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将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海外华侨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钱，就这样落入了贪官的私囊，怎能不教陈嘉庚痛心疾首。他在重庆逗留期间，拜访了自蒋介石以下的许多国民党高官，多数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回国之前，陈嘉庚在政治上不偏不倚，一心一意拥护国民党中央团结抗日，认为拥护抗战的统帅天经地义。这次回国亲眼看到了当局消极抗战，人民生活悲惨，官吏贪污腐化，不禁大失所望，对国家前途感到渺茫。他私下对人说：“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在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但现在又不能说。”心中十分苦闷。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同社会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听到了许多攻击延安解放区的话，说什么“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等，无奇不有。而中共参

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也专程拜访了陈嘉庚，送给他三件陕北出产的羊毛衫，同他讨论了解决国共摩擦的问题。陈嘉庚对他听到的事情将信将疑，决心亲往延安，看个究竟。

听说陈嘉庚要去延安，国民党蒋介石十分紧张，想方设法阻止他与中共接近。5月5日，陈嘉庚抵达成都。此时蒋介石正好也到了成都，他请陈嘉庚赴宴，又留他谈话。探问他的行程安排，陈嘉庚告诉蒋介石，他要去兰州和西安。蒋介石追问他还要去什么地方，陈嘉庚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车，他想去延安。听到这里，蒋介石就大骂起共产党来，什么“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等等，意图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再没理由阻止陈嘉庚，却没忘“提醒”他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5月30日，陈嘉庚一行从西安出发，乘坐第18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两辆汽车，向延安进发，临出发前，陕西省政府一个寿科长也乘一辆车赶来“陪同”。途中，遇到一些“民众”往陈嘉庚的车上递攻击共产党的“控诉书”，内容都大同小异。陈嘉庚不难识破这种导演出的把戏，他把“控诉书”拿给寿科长看，然后撕碎弃置路旁。

5月31日，陈嘉庚抵达延安。在七天的参观访问中，他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应邀参加了讲演会，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参观了学校、工厂，并和在延安的归侨和集美、厦大两校校友深谈，询问他们在延安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所见所闻，使他耳目一新。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共产党领导人的作风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他们生活简朴。毛泽东的窑洞，布置简单，墙上一张地图，室内一张办公桌，几把木椅、一条长凳，都是些乡村农民用的旧式家俱。毛泽东本人衣着朴素，招待陈嘉庚的晚餐，仅仅是白菜、咸饭和一碗鸡汤。饭菜虽然简单，但是陈嘉庚吃得非常舒心。共产党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总司令部，长官与士兵的伙食一样，食堂没有固定的座位，一台8个人坐满了就可以开饭。陈嘉庚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迟到，自己盛了饭，插进勤务兵中间，狼吞虎咽起来。陈嘉庚拜访毛泽东时，谈话中朱德、王明和几个华侨学生先后很随便地走进来，加入了谈话。又一次，陈嘉庚介绍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一个战士迟到了，看见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就挤进去坐下，毛泽东也往旁边移了移，让他坐得舒服一点。这一切，都使陈嘉庚感到惊奇。回想蒋介石接见时，好些中央大员都早早在内等候，蒋介石的座车一到，传令兵高喊“蒋委员长到！”全体人员立刻肃立，大气不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他卸去大氅，他挥手请大家就坐，众人方能惶恐就坐，陈嘉庚仿佛见到了皇帝。相形之下，延安解放区领导人平易近人、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大家刻苦耐劳，从事建设，一派蓬勃向上气氛。

陈嘉庚留心观察了延安社会，发现社会风气纯朴，社会秩序安定。陕北虽然贫困，但在延安没有见到乞丐，没有面黄肌瘦、衣着破烂的人。人们穿着朴素，作风严肃。商店私营，营业自由。革除了缠足的恶习，鸦片也被严禁。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教育也有发展，共产党人和解放区人民在埋头苦干。

陈嘉庚在延安特别同华侨子女进行了多次晤谈，反复向他们了解共产

党、八路军是真的打日本还是打内战？共产党是否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又问他们是怎样到延安的，生活习惯不习惯？这些华侨青年告诉陈嘉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南洋不少青年学生在延安学习后都已经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还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当局用华侨捐献的巨款买来飞机大炮不去打日本，却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用几十万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到处搞摩擦。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解放区人民的生存，共产党号召军民开荒种粮、养猪、种菜，解决吃穿，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粉碎了对解放区的封锁。华侨青年们说，延安的自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但是他们的精神非常愉快，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男女平等，互相尊重，国民党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是造谣污蔑。华侨子女的肺腑之言彻底打消了陈嘉庚的疑虑。他通过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得出了同国民党宣传相反的结论。他相信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当毛主席拜托他见到蒋介石时，代为表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并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向侨胞介绍时，他一口答应，决意“凭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关系人问余所见闻者，余定据实报告。”

在延安，陈嘉庚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他后来追述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汽，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他的心情由郁闷失望转为欢畅，充满信心，确信中国已经有了救星。但在当时，他并没有表露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未有一句话奖誉他等，虽衷心表同情多项，然绝未轻说出口。所有发言，无非劝诫其忍耐退让，以国家为前提，团结抗日为天职。”希望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6月8日，陈嘉庚一行告别了延安，赴各地继续考察。一路上国民党当局又不断制造出一些骗局，污蔑共产党，一些党政要人也在陈嘉庚的面前对共产党漫骂诅咒。陈嘉庚不动声色，冷眼旁观。7月中旬，陈嘉庚回到了重庆。24日，他应邀到国民外交协会作讲演，演讲《西北之观感》。出席讲演会的有各界人士几百人，人们对他的延安之行充满好奇，会场坐得满满的。这时，陈嘉庚终于道出了蕴藏已久的的心里话，向大后方公众公开了他在延安的见闻，列举他在延安看到的种种新气象，并呼吁举国一致，团结抗战。陈嘉庚的讲演说出了国民党当局最怕大后方人民了解的事实真象，引起了轰动，也使国民党党政要人大为不满。陈嘉庚离开重庆前，又见到了蒋介石。陈嘉庚婉转地规劝国民党要革新政治，蒋介石竟气急败坏地喊叫起来，“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种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如此！”盛怒下的蒋介石也说出了他把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仇视共产党甚于日本侵略者的心里话。陈嘉庚不打算同他争辩，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蒋介石，“华侨心理，甚盼望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况共产党无军械厂，实力单薄。”言毕辞出。国民党没法迫使陈嘉庚改变看法，也无力阻止他发表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观感，便从着力拉拢陈嘉庚转为打击他。7月底，陈嘉庚取道昆明，经广州、

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家乡福建视察。在浙江金华收到朋友的信，告知国民党当局对他实行三项阴谋，露出一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狰狞面孔。陈嘉庚没有被吓住，他在以后的行程中继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继续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着，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依然敢怒敢言，为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仗义执言，向当局，或直接向国民党中央蒋介石呼吁，得到的只是一纸“护恶讳疾”的回电。1940年底，陈嘉庚回到了新加坡。他离开祖国时，对蒋介石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回国考察，是陈嘉庚一生重要的转折。虽然他希望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初衰未改，但是显然从不偏不倚，无党无派的立场向同情和支持共产党转变。离开祖国后，他向南洋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和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统区的黑暗，了解到解放区的光明。他还针对国民党官员的祸闽行为，发起闽侨救乡运动。陈嘉庚的直言不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派出大员到南洋策划倒陈阴谋，企图煽动华侨反对陈嘉庚，破坏华侨的团结。这时，南侨总会即将召开第二届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期间自相倾轧，便提出辞职，引起侨胞广泛关注。1941年3月29日，第二届南侨大会召开。陈嘉庚虽一再表示辞退，仍以绝对多数票额当选，连任主席。国民党的倒陈阴谋破产了，陈嘉庚继续领导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六、避难爪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凶猛地扑向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各殖民地。战火迅速烧到风平浪静的南洋。日军在马来半岛登陆后，新加坡遭到轰炸，形势危急。危难中，陈嘉庚应新加坡总督之请，挺身而出，为新加坡抵抗运动和居民的安全奔忙。他布置华侨挖防空壕；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亲任会长，有组织地开展抗敌救援活动，协助英国政府抗战。然而此时，战局正在急转直下，日寇在马来亚步步进逼，殖民地的英国军队一败涂地，仓惶撤退，到1月底，除新加坡外，其余地方均落入日寇之手。还在殖民政府放弃槟榔屿时，殖民当局将英国人撤退到新加坡，而对其他居民撒手不管，卑鄙自私暴露无遗。1942年1月，英国决定放弃新加坡，开始撤退人员，到月底已大部撤完，却秘而不宣。1月30日，陈嘉庚闻讯去见新加坡总督，又得知蒋介石曾致电新加坡总督，要求必要时设法保证国民政府领事馆官员安全回国。无论是殖民地当局，还是国民党政府，完全无视华侨领袖和民众的安全。特别是被华侨视为祖国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花着华侨用血汗换来的巨款，却在生死关头把他们抛弃，使他们再一次领受到“海外孤儿”的滋味，怎不让他们感到寒心和愤慨。与陈嘉庚同去见总督的另一侨领当时就气愤地说：“蒋介石不认我们是中国人了！”

1月31日，英国炸毁了马来亚柔佛通往新加坡的大桥，切断了与马来亚的交通。第二天，又烧掉了军港内的10个贮油池。新加坡沦陷在即。陈嘉庚决定撤离。2月2日，他安排处理了南侨总会、闽侨总会、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和集美学校等项事务，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于2月3日一早，在几位友人陪同下，乘一艘小艇，离开了新加坡。陈嘉庚清楚地知道，由于他对延安，特别是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说了实话，因而有国不能回，国民党要人决不容他立足。因而就近驶往荷属印度尼西亚。他先进入印尼苏门答腊

岛，打算从巨港去爪哇岛的吧城（雅加达）。他们还未到巨港，巨港就已被日军占领。几经周折，2月28日抵达雅加达。可也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在爪哇登陆，雅加达也不可留。陈嘉庚又开始逃亡，辗转芝安士、梭罗（苏腊卡尔塔）等地后，在玛琅安顿下来，住巴蓝街4号。陈嘉庚化名李文雪，与厦大、集美校友黄丹季和郭应麟、林翠锦一家同住，作为掩护。后来为安全缘故又搬过几次家，最后在巽勿佐村，居住到战争结束。

日军侵占南洋的时候，曾四处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陷于敌人包围之中，以近70的高龄，东奔西走，几次遇险，由于他处惊不乱，校友们应对有方，才得以转危为安。一天清晨，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所，穷凶极恶地敲门，直到冲进院子，才发现搞错了，原来他们是来抓邻院的荷兰人的。又一次，陈嘉庚正在屋内躺椅上看书，一个日本军官闯了进来，用印尼话大声问你是谁？陈嘉庚镇静地坐了起来，一言不发，日本人正要发作，校友黄丹季闻声赶来，机智地示意老人耳聋，才算解了围。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不时传出流言，什么“陈嘉庚潜入东爪哇”了，什么“陈嘉庚被逮捕了”等等，使侨胞们深为他的安全担心。陈嘉庚却对身边的校友说：“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我着急。”他自信“生平对国家社会尚无罪恶，于财色嗜欲亦绝无污染，问心无愧”，安危听天由命。在这样大义凛然的精神支配下，陈嘉庚身处险境仍从容不迫，生活简朴而有规律，早睡早起，做操散步，还曾租了小块土地，指导校友种菜，收获不菲。1943年，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记述写回忆录的缘由说：“此回忆录盖为纪念华侨参加抗敌而作。”他要使“海内外同胞知南侨对抗战之努力，以及对祖国战时经济之关系”。他说，“个人经历虽不足道，然所见所闻多属确切事实，有裨社会观感，且使后人知当祖国抗战时，南洋华侨之工作情况，庶不致误以为当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危险期间，海外南洋千万人之华侨，尚坦然置之度外而忘祖国也。”耗费了一年的心血，一部30万字的回忆录脱稿，定名《南侨回忆录》。陈嘉庚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他和南洋华侨爱国爱乡抗敌报国的奋斗轨迹，记录了南洋华侨在民国建立后为祖国作出的贡献，也坦露了老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在书末，他附诗一首以述志：

胜利未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余惟置生死于度外，作俚诗一首以见志。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首予劝诫勿昧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岛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掳，抵死无颜谄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吉凶如有定，付之天命惧何益。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嘉庚结束了避难生活，10月，安全回到新加坡。消息传开，群情欢腾。新加坡500个华侨社团联合举行了欢迎会。11月8日，重庆10团体发起“陈嘉庚先生安全庆祝大会”，郭沫若、

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了庆祝会。毛泽东送来了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送来了祝辞：“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诤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冯玉祥送来了贺诗：“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大会由邵力子主持，他热情赞颂陈嘉庚的一生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郭沫若更说道，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人要把中国人民推到深渊，希望陈嘉庚能为老百姓讲几句诚实公正的话。情况正是如此，日本侵略者刚被赶走，中国又陷入了内战危机，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即将来临，陈嘉庚继续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奔忙着。他放弃了无党无派的政治立场，公开站到了人民解放事业一边，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新贡献。

七、投身人民解放事业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不久，国内传来了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的消息。许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和平民主建国，前途乐观。而陈嘉庚却看透了国民党当局独裁腐败，反共反民主的本质，断定内战一定会打起来。在香港《华商报》请他为“双十协定”题词时，写下了“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十六个字，表达了他对时局与众不同的深刻见解。果然，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美国人出钱出枪，出动军舰、飞机把50多万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前线，并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进驻上海、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径激起陈嘉庚的无比愤慨。他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参众两院议长、美国特使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国援蒋内战，警告美国“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要求美国“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陈嘉庚的电报像一颗炸弹炸响，引起了巨大震动。华侨社会掀起了“反陈”与“拥陈”的轩然大波。国民党控制的马来亚、新加坡大小中文报纸，拒不登载陈嘉庚的电文，对他百般诋毁攻击。另一方面，马来亚、新加坡数百个华侨社团，针锋相对地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拥陈”，又有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美军留华的签名运动。独裁与反独裁、民主与反民主力量进行了激烈交锋，最后民主力量占了优势。陈嘉庚后来回忆说：“马来亚各处国民党机关及报纸，对余百般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谩骂，遍贴标语。惟全马诸民主派及劳动界、妇女界、青年人等，愤恨不平，在各地亦召集大会，拥护余之通电，其他侨民表同情者亦众。”这一事件，使陈嘉庚和华侨民主派深感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宣传阵地，作为民主派的喉舌，为和平民主呼吁。在华侨民主派的推动下，陈嘉庚联络各帮侨领，创立了南侨报社有限公司，亲任董事会主席，以胡愈之为社长。陈嘉庚为报纸确定了反蒋拥共的原则立场。1946年11月21日，《南侨日报》出版发行。陈嘉庚在创刊号上发表《告读者》一文，阐述了办报宗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创立

《南侨日报》，其目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胡愈之在《创刊词》中指出，“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是民主堡垒。”《南侨日报》宣传国内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华侨爱国团结，也就马来亚、新加坡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看法，为侨民的自身利益服务，受到广大侨胞的信任和欢迎。陈嘉庚本人也在《南侨日报》上发表了许多专论和演讲词，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蒋介石必败的信念。

1949年1月，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陈嘉庚，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陈嘉庚欣然复电应允。

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人的迎接。15日，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会上致词欢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满怀希望地展望：联合政府成立后海外华侨的地位可以提高，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期望将会实现，绝大多数华侨都会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会后，陈嘉庚离开北京，前往东北、内蒙各地观察考察，两个多月时间，行程5000多公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得出结论：“从东北看全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从东北回到北京，陈嘉庚作为政协华侨小组的召集人，参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海内外中国人多年的企盼终于成为现实。陈嘉庚激动万分，无比自豪，他在会上以华侨首席代表的名义致词，热烈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三项草案，并以其德高望重，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伟大的历史时刻，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望着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雄壮的国歌声和礼炮声中，在万众欢呼声中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中国的新生。

八、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

新中国建立后，年过古稀的陈嘉庚又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光和热。为此他决定回国定居。

1950年2月，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向华侨群众宣讲介绍了他在新中国南北各地的观感，报告了中国的新气象，解答了华侨对新中国政策的疑问，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自豪与自信。他把这些观感，汇集成《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发行60万册，成为海外人士了解新中国的宝贵资料。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事务料理完毕，自己的全部款项汇回国内。5月，在海外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陈嘉庚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定居集美。

陈嘉庚回国后，继续担任国家重要职务。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外，还当选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委会委员，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凡有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出席，总是带着他通过亲自考察和实地调查得出的提案和建议，为国家重大决策，贡献自己的才智。他关心国家前途，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到工业化建设，他都予以支持，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陈嘉庚素来痛恨尸位素餐的官僚作风，因而他自己担任重要社会职务后，总是不辞辛苦地履行职责。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争取时间到各地旅行考察，风尘仆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他重访了1940年回国时到过的西安、延安、兰州、贵州，又走访遥远的边陲——新疆和海南岛。他对祖国进步、人民生活改善感到高兴。看到好经验，对人民有利的做法，就立即建议推广；看到不好的现象，则提出批评。在新疆独山子石油矿区，他看到新建的职工宿舍结构简单但设备齐全，实用又节约，当晚就不顾疲劳搜集资料，亲自给周总理写信，建议作为城市住房建筑的参考。他对长春地质学院在原皇宫基础上盖地质宫很有意见，批评是“全国最高额造价”，“既不美观，又不实用，实在是浪费的典型。”他将考察见闻写信报告给毛主席、周总理，直言不讳地附上自己的提案建议。据他的友人回忆，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国内已出现“左”的倾向，而陈嘉庚在怀仁堂讲台上痛斥官僚主义弊端“懈怠傲慢，……虽清白不贪污，亦难免误国病民，例如高高在上，凡事皆向下面推诿，绝不自己动手，甚至连执笔签名亦假手他人。……发生文件多未经亲阅，甚至自己尚不知情，所以弄权舞弊，轻率错误诸端，皆缘此发生。又如坐在办公厅内，足不出户，外间实际情形，属下工作情况，毫无所知。”这番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是痛快淋漓，切中时弊。这正是他的性格，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和涉外事务，只要有不同意见，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陈嘉庚的晚年，一面为国事奔忙，一面为改变家乡经济落后的面貌，发展家乡教育呕心沥血。福建省境内多山，交通不便，解放前一寸铁路也没有。解放后海峡两岸军事对峙，海上通路也被阻断，使福建经济深受影响。1950年，陈嘉庚带着福建人民的渴望，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获得通过。这条铁路1954年开工兴建。陈嘉庚欣喜异常，对铁路的修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当时铁路部门提出了三条选线方案，福建省领导到集美与陈嘉庚磋商，向他介绍了各线的地形、地质、矿产、气候、水文、植被、人口、政区、经济的概况和三个方案的优缺点，陈嘉庚选中了中线，后来鹰潭到厦门的铁路，就是按这个方案修建的。他又建议填建杏林——集美海堤，可以缩短铁路里程；可以围杏林湾为水产养殖场，能够养淡、垦田三万亩；还可以在上头修水库蓄水，灌溉农田、增加厦门供水，是个一举多得的方案。但是遭到苏联专家的反对。陈嘉庚针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作出详细分析，写报告给周总理，据理力争。经反复讨论，陈嘉庚认真负责的建议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同和中央的批准，铁路按照陈嘉庚的方案修建，1956年建成通车，结束了福建没有铁路的历史，对福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建的教育，渗透了陈嘉庚毕生的心血。定居集美后，他不肯安享晚年，依旧为扩充和发展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投入大量精力。解放后，人民政府考虑到集美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海内外声誉，希望陈嘉庚维持私立的名义，由政府给予部分补助。陈嘉庚不想给国家增添负担，便应承下来。他想方设法向海外亲友筹措经费，使集美学校很快就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从1950年到1955年，陈嘉庚拨给集美学校353余万元，国家补助200余万元，在他的主持和监督下，集美新建了大批校舍和公共设施，扩充了图书馆、科学馆、医院，增设了电影俱乐部，拥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水产航海学校、财经学校、华侨学生补习学校等6所学校，在校学生5000多人，差不多是解放前学

生人数最多时（1931年）的两倍。1955年12月，陈嘉庚把集美学校董事会改组为集美学校委员会。从1956年1月开始，除幼儿园、小学及公共机关外，各校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学校虽然改为公办，陈嘉庚依然牵挂着集美，亲自计划校舍的扩建。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不避风雨寒暑，扶着手杖，每天到工地去巡视、督促、指挥，专心致志，从来不知疲倦。就这样，数十座大楼拔地而起，构成了一片雄伟壮丽、民族风格鲜明的建筑群，为厦门增添了一处著名景观。学校的规模也在继续扩大，到1960年，在校生达到了11600多人。

厦门大学新校舍也是陈嘉庚亲自筹集经费，设计监督建设的。他曾俯瞰厦大校址，设想建设一片美丽的校园，“我要完成这个大业，我完成不了，有我的儿女，有我海外的亲友，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强大的新中国。”当31座傍山面海的厦大新建筑建成后，陈嘉庚深情地谈起了他的理想：“台湾统一后，将有万吨十万吨的外国和本国的轮船从东海进入厦门，让他们一开进厦门港就看到新建的厦门大学，……看到新中国的新气象。那巨大的客轮中将载来许多来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学习的华侨子女。”他为厦大的校舍建设操劳，也关心着厦大的办学方向。厦门大学确定“面向东南亚华侨，面向海洋”发展；成立南洋研究所，开展华侨问题和历史以及南洋各国情况的研究；成立海洋研究所，为经济建设、海洋交通事业、海洋科学和教学服务；设置东南亚经济和历史、海洋生物、物理、化学以及印尼语等专业；招收华侨学生；设置海外华侨函授部，都征求过陈嘉庚的意见，并得到他的同意和支持。

陈嘉庚办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经济，对此他十分认真。从他关心航海教育上可见一斑。1951年，集美增设了水产商船专科，1953年并入大连海运学院。陈嘉庚认为福建地处海疆，需要大量航海专业人才，集美航专有一定基础，应该发挥作用，不应并掉。尽管如此，陈嘉庚仍然希望合并后，学校能够发展提高。1955年，他前往大连视察，发现该院实习设备不够充实，冗负严重未能革除，他对此作了严肃批评，并向有关部门建议及时整顿。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意见，1958年开始独立开办集美航校。

终其一生，陈嘉庚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他花在文化教育上的钱，按照黄金价格计算，约合80年代初人民币一亿五千万。但他自己的生活，一直十分简朴。他在集美故里，原有一栋二层小楼，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回集美定居后，他主持修建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许多华美的大厦，却没有给自己的旧居添上一砖一瓦，一直住在集美学校董事会的一间小屋内。1955年，集美镇政府重修了他的旧居并借作办公用房，1958年后归还，他才搬回，住在楼上一个小套间里。他的居室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旧床，一张写字桌，两个沙发。其中一个一边扶手是平面的，是托人特意从上海旧货店买来的，因为他有腰腿病，不能长久伏桌写字，需要坐在沙发上书写。此外，还有一口装水的小瓷缸，一个普通的洗脸盆，两只年月已久的旧皮箱和几把凳子。他的衣服被褥除两三套较好的外出当作礼服用外，都是穿用多年，处处补丁。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两个鸡蛋，午餐、晚餐都是番薯稀饭，佐以青菜、豆类、腐乳、小鱼小虾等。他待客也是这几样东西，至多添上几样蚝煎、炒米粉和芋头等家乡风味。在闽南等地考察时，他都自备咸粥、年糕等简单的饭食，不要当地单位破费招待。他常说，“在事业上用钱，该花的千百万元也要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他担任公职，政府给他定的工资是三级，每月390元，加上地区补贴共539.80元，他把自己的伙食

费定为 15 元，把节省的钱都用作建校费用。对于晚辈要求严格，教导他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单纯看重钱。我的钱是学校的钱，是国家的财富，我的钱不能留给子孙后代。”

1958 年，一向身体健康的陈嘉庚发现自己患了鳞状上皮癌，1961 年又得了脑溢血。重病中，陈嘉庚向友人交待了后事。他把在国内银行的存款 334 万多元，捐 50 万元作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另 50 万元作集美社福利基金，剩余的 234 万元全部用于集美校舍建设。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孙。他最后留下遗言：“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中国有两派，旧的一派是国民党，这一派很坏；新的是共产党，她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人都有一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他们逃到台湾去了，那些人一生自私自利，假公济私，现在还在捣乱。我们应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归中国。”他念念不忘集美学校，嘱咐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

1961 年 8 月 12 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 88 岁。他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给予他崇高的评价和礼遇，将他的灵柩送回故乡，安息在集美。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他的爱国精神却永世长存。

